

中国的对日政策及其国内背景

刘江永

[摘要]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日本政局动荡,政策多变。与此相比,中国对日本政策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中国对日本政策重点和具体做法也会有所调整。这些主要是针对日本方面发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同时也与中国国内外一些因素的变化有关。相关研究通常是日本专家学者热衷研究的题目,但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增进相互理解,中日两国互不为敌,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国共同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 中国外交; 中国对日政策; 中日关系; 钓鱼岛;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D829.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2)05-0003-(12)

[收稿日期] 2012-06-15

[作者简介] 刘江永(1953-),男,北京人,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84)

一、新中国的对日政策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对日政策和外交实践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 对日政策协调机制的发展变化

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当时,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由国务院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直接负责,在国务院外事办成立了日本组,不定期地及时召集多个部门的日本问题专家分析形势,研究如何与日方交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这一对日协调机制对中央决策和各部门贯彻执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相关工作基本上转到外交部。进入21世纪,中国对日政策的制定仍然是由中国外交部主要负责。同时,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协调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等各有关部门研究讨论,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服务。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以外交部为主体推进对日外交,通过议会、政党、防务、教育、体育、文化、民间、地方友好城市、青少年及各种友好团体交往,全面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

(二) 长远目标不变、阶段性目标不同

中国对日政策的大目标历来十分明确,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生前指出的“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的长期国策”。“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1](141)} 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在不同时期就要有具体的对日外交努力目标。在上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时期,中国对日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反对美日两国政府针对中国的冷战政策,要求美日同台湾当局断交。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的对日政策目标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争取

日本的资金、技术合作。通过加强中日关系,促进中美建交。随着中日、中美关系改善,中国不再反对《美日安全条约》。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日政策目标是,以日本为突破口改善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实现天皇访华,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反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把台湾纳入所谓“周边事态”。21世纪初中国对日政策目标是,抵制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的干扰,促使日本领导人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妥善处理钓鱼岛等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三) 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原则。

中国对日外交在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上,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就曾提出“对日政治三原则”、“中日贸易三原则”和“中日复交三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明确反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论”。^[2]正是由于中方坚持了原则,日方最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写入“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承认台湾归还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周总理经常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小平同志指出: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讲历史,主要目的是吸取历史教训。针对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教科书问题,邓小平强调“孤立起来看,问题并不大,但积累起来就代表了一种倾向,一种力量,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两国领导人要及时加以解决。^{[1](143)}正是由于江泽民、胡锦涛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也坚持了一贯的原则立场,才迫使小泉纯一郎之后的日本领导人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慎重行事。^①很显然,在同日本交往中,如果丧失原则就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损害中国外交斗争成果。中国人民会失望,日本国内进步势力也会感到失望。

(四) 着眼人民,通情达理

中国领导人历来强调,中日友好是民心所向,中日友好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心。针对日本,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必须把广大日本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罪魁祸首区别对待;把战后和平发展的日本与战前军国主义的日本区别对待;把日本政府和民间对华友好或处于中间状态的大多数人与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区别对待。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总是抽出时间与日本民众坦诚交往。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特大地震与福岛核事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到日本驻华使馆吊唁处吊唁。同年5月,温家宝在出席第四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前,特意前往发生核事故的福岛县避难所慰问日本民众。温总理给那里的孩子们带去熊猫玩具、音乐光盘、手电筒等,并应邀为日本普通民众题字,鼓励他们微笑着生活下去。温总理到日本灾区转达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和福岛人民的亲切慰问,以及对遇难人们的沉痛哀悼。

(五) 着眼长远,重视青年

日本民间蕴藏着巨大的友好能量。新中国对日外交首先是通过遣返日本侨民、战俘及战犯开始的。在两国尚无外交关系的时期,我对日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经促政、官民并举的方针,成效显著。20世纪50~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会见了日本各界众多人士。当年周总理会见的年轻日本政治家,后来都为中日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已故前外相园田直等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中国前驻日大使杨振亚与日本首相竹下登(已故)在年轻时期建立的友好关系,也确保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领导人经常强调:中日友好的未来在青少年。1965年在北京举行了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1984年中国政府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为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胡锦涛主席当年参加了这些活动,同日本青年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在二十多年后会见当年的老朋友时曾满怀感慨地说“岁月可以改变人们的容颜,但改变不了人间的友情。”这样的经历告诉我,

^① 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曾遇到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期间遇到桥本龙太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期间遇到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方都表明了严正立场。今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会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战前曾由日本军部把持的国家宗教设施、如今供奉着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

“青年时代播下的友谊种子,将永远伴随着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共同努力,让中日友好的种子广泛播撒,让中日友好的旗帜代代相传。”^①

(六) 妥善处理敏感问题,争取合作共赢

例如,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都搁置了钓鱼岛争议问题。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荣首相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主动问及对“尖阁列岛”怎么看。周总理表示,现在谈这个问题不好。中日双方在回避钓鱼岛主权争议的情况下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时,首次向日方提出,为早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还是搁置钓鱼岛主权问题为好。1978年邓小平又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3]邓小平在1978年10月25日答日本记者问时称“在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也同样就不涉及这个问题达成一致”,“可以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4]江泽民在2001年8月6日关于《同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点。^[5]中日双方虽然没有书面协议,但在谈判过程中求同存异,曾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政治默契。2008年,中国同日本就东海共同开发及合作开发达成初步共识。

(七) 重视媒体,增进相互理解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伴随世代交替,两国民间的彼此认知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两国民众生活的信息传播方式伴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除了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外,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对两国的年轻人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前会见日本主要媒体驻京代表,为“暖春之旅”定下基调,取得了良好效果。《人民日报》、《中国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中国》杂志等中国主流媒体,都保持着与日本新闻界的交往与合作。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各大报和电视台对中国报道比较消极。日本一些反华的右翼杂志、书籍到处可见。与此相比,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比较客观全面。但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某些情绪化的极端意见也经常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的关联性

如下图所示,中国对日本的政策是由中国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历史问题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历史问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理解。所谓狭义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政要关于历史问题的言行等,大多属于对历史的认知问题。广义的历史问题则包括与历史认知相关的中日之间的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争议问题等。这里拟从广义的角度谈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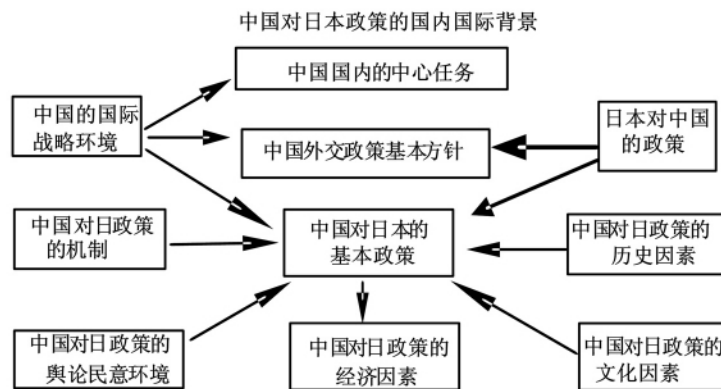
(一) 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

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顽固坚持每年参拜一次靖国神社,严重损害和动摇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6]2005年中国民众自发举行示威游行,是自1985年针对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举行示威游行以来的第一次。此后,2010年10月,围绕钓鱼岛问题,中国各大城市再度爆发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

^① 2008年5月8日胡锦涛主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的重要演讲。

日本有一种看法认为,2005年4月中国发生反日游行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差距扩大,民众郁积着不满,但由于没有言论自由,“结果就以‘反日’为撒气筒的形式表现出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认为,“其更深层次背景是‘共产党正统性’的问题。本来是提倡‘共产主义’的哲学,但引进市场经济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入了资本家也可成为共产党员的时代,原有的那种哲学事实上已经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到哪儿寻找政权的正统性呢,就是‘战胜日军’的光荣历史。共产党才是唯一能够保卫、解放人民的。这就是他们的信心所在,并作为‘只有我们才能成为领导’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尽量体现日军残暴才好。”^[7]

图1 影响中国对日本政策的各种因素



然而,上述偏见并不符合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中国民众这三次自发游行的共同点都是针对日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为作出的反应。后两次民众游行的不同点是:第一,在小泉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集中爆发,必然遭到中国政府严正交涉和中国民众强烈反对。第二,中国进入国际互联网的信息化社会,人们通过电脑、手机自由交换信息,可以更加自由和充分地表达个人的看法。因此发生游行的范围更大、地点更多,连日本企业较多的上海也发生了抗议示威游行。第三,在信息化社会,中国民众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华游行而迅速发起游行的“对抗性”、“连动性”更加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曾出现个别人的过激行为。中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稳定和中国社会秩序稳定,在保障民众言论自由的同时,对民众的自发游行进行了必要的疏导和控制。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指出,“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半个世纪里,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如何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问题,成为战后中日关系重建和发展的核心问题。”^[8]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只要这两大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中日关系就能顺利向前发展。反之,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就会受到损害,两国关系就会遇到挫折,甚至出现倒退。

(二) 缠绕在一起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与历史问题

对中国来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日本政府称“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隶属冲绳县管辖。但是,冲绳县曾经是独立的琉球王国,而并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岛也不是琉球的一部分,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历史上,日本向亚洲邻国侵略扩张有两个方向:一是朝鲜半岛;二是琉球及台湾。钓鱼岛问题正是日本明治政府趁中国清政府衰落时期吞并琉球、霸占台湾过程中发生并延续至今的。

丰臣秀吉刚实现日本封建国家的统一,便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出兵朝鲜。这堪称是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发端。当时,朝鲜请求中国明朝政府出兵,两次打败了日军。日本出兵朝鲜失败后的第12年,1609年3月,在德川幕府授意下,日本的萨摩藩出兵琉球。此后,日本表面允许琉球王国的存在,但要求琉球向日本朝贡。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衰落。日本则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崛起并开始对

外扩张。1871年,明治政府把琉球国划为由日本外务省管辖的“琉球藩”,强迫琉球断绝向中国朝贡的关系。同年12月,琉球的八重山地区岛民飘至台湾,有54人被杀。当时,日本政府并未同意出兵台湾,而是加紧吞并琉球。1872年10月,日本把琉球国王任命为琉球藩王,取消了琉球的外交权。1873年3月又发生小田县(今冈山县)县民4名人员漂至台湾遇害事件。1874年2月,西乡从道借机率日军出兵台湾。美国前驻厦门领事李仙德(Le Gender, C. W)充当日本入侵台湾的顾问。^[9]中国清朝政府向日方提出抗议,指出台湾属中国版图,要求日方撤兵。日军受到台湾抵抗,遇到流行疟疾,伤亡惨重,只好与中方谈判,同意有条件撤兵。

1874年10月,中日签署了《中日北京专约》。其中称,“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作为“退兵善后办法”规定三条:一是日本此次行动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是中国偿付遇害难民之家抚恤银两,为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筹补银两(共计50万两);三是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中国保证航客不再受凶害。^[10]日方称,清政府在专约中已承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等于承认琉球是日本领有。清政府对此表示反对,称琉球是中国的属国,北京专约所指之“民”是指1873年漂流到台湾被生番杀害的小田县(今冈山县)县民,而不包括1871年被杀害的琉球漂民。然而,已决心吞并琉球的日本明治政府对中国的解释置之不理,1879年3月再次出兵琉球,将琉球藩改名为“冲绳县”。遭到中方反对后,日方提出把琉球一分为二,即把那霸及其以北各岛划归日本,把八重山、宫古群岛划归中国,以换取中方让步。对此,中方有人主张琉球一分为三,即中日在分别占有琉球南北各岛的同时,保留那霸琉球王国。但是,清朝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结果中日关于琉球的谈判不了了之。日本吞并琉球后,立即开始以琉球为立足点向外扩张,寻找新的岛屿占有。钓鱼岛列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884年被日本发现的。1885年日本政府秘密调查钓鱼岛的结论是“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且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等之传闻,对中国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11]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于1895年1月14日秘密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同年4月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岛。此后,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国台湾省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二战后,截至1972年9月,日本追随美国的冷战政策,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存在严重分歧,结果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迟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半官半民的方式推进中日关系,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访华。中国两国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了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并就钓鱼岛领土主权争议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伴随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于1978年8月12日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当时邓小平就钓鱼岛争议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迄今没有改变。

三、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日本有人把中日政治关系冷淡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认为: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对此,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明确指出“我们日本人绝不要忘记,其根源在于,包括从他们父母、祖父母那了解到日本侵略中国时的经历所产生的痛恨。用英语说,叫做‘family story’”他强调,“我衷心希望在中国工作或者要在中国工作的人铭记这一点。如果没有对中国人痛恨的理解,与中国人的

沟通就会极其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沟通。”^[12]

(一)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友好并不矛盾。在中国,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并不等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包括狭隘的民族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也包括健康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只顾本国民族利益而无视甚至损害别国利益。极端民族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方式,以极端言行、盲目排外为特征,很可能滑向国家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健康的民族主义则是强调各民族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爱国主义。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觉醒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中即包括民族主义。它包括两重含义:一是针对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实现共和国的理想;二是针对西方列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但并未能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真正实现孙中山遗愿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便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开。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俘虏日军官兵7118人。根据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野坂参三的建议,在延安创建了“日本工农学校”,由野坂任校长,对日本战俘进行教育和改造。1937年10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处理俘虏的六条命令:“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二、不取俘虏财物,惟军用品应没收之;三、医治敌军伤兵;四、在可能条件下,将俘虏放回,并给路费;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13]结果,一些日本战俘自愿加入了八路军,奋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然而,同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却制造了屠杀中国平民和战俘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历史虽然过去了,但中华民族受到外国入侵民族屈辱的“被害意识”与“民族悲情”的精神伤疤仍然深深地留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不就此表示忏悔,反而否认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这必然会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如何防止这种民族情绪走向极端,而保持在理性的爱国主义范畴,是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责任。

(二)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教育与中日友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决定奉行中日友好政策。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说过“现在日本的位置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14]新中国政府并不主张民族主义,而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安门城楼红墙上有两幅标语: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体现了爱国主义;二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体现了国际主义。中国的对日政策主要是着眼人民,着眼长远,把日本军国主义战犯与一般民众区别开,反对战胜国对战败国进行报复。因此,中国政府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新中国政府历来反对极端或狭隘的民族主义。1978年之后,虽然不再强调国际主义,避免给其他国际造成“输出革命”的印象,但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即便在中日关系出现曲折时,中国政府仍强调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即便是在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厅里,展览的结尾部分仍然强调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要努力世代友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日本的方针政策是一贯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制定的,没有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正是为确保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才一贯强调,要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中那段不幸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说“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

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3]198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制裁”。但日本率先恢复对华日元贷款和两国高层往来,并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呼吁“不应孤立中国”。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成为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首脑。1992年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同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并促成同年10月明仁天皇访华。江泽民在这次访问中指出:正确对待中日关系中那段不幸历史,对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日本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15]

进入21世纪,中国发展壮大,但对日政策并未改变。胡锦涛主席主张“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①习近平国家副主席2009年访日时也表示“中日关系对中日双方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是促进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积极因素。”^②迄今,中国政府同日本交往时一直强调,两国要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相关政治文件,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 中国的社会信息化、民主化与中日关系

关于历史的记忆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人们往往只注意人的因素、政治因素,而忽视影像技术、信息技术划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笔者想从这一角度,做一分析。

1. 摄影、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在近代历史上其他列强也入侵过中国,但当时没有影像资料,人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这些历史。但是,由于20世纪摄影技术的发展,日本帝国的侵略暴行被大量纪录片和照片记录下来,使今天的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年战争的残酷与侵略者的罪恶。伴随20世纪90年代信息化社会的到来,民众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互联网络等新媒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国对日政策的舆论民意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极大变化。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城市普通居民家庭尚未普及电话,90年代中期普通家庭尚未使用国际互联网。进入21世纪,中国信息化高速发展带来整个社会跳跃式地跨入信息化社会。2002年中国上网总人数已超过日本,达5910万人,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综述已达4.85亿人,同年底将超过5亿人,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人口总和。中国年轻一代的受害意识不完全是来自历史记忆,而是来自他们对现实的亲身感受。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那种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而推崇西方的“自由化思潮”逐渐退潮。90年代以来,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们的爱国主义表现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发性,不需要政府动员;二是针对性,主要是针对美国尤其是日本。这与其说是受到中国政府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美日反面教员的刺激。例如,1993年美国制造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在中国海南附近海域发生“撞机事件”;2001年至2006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11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方扣押中方船长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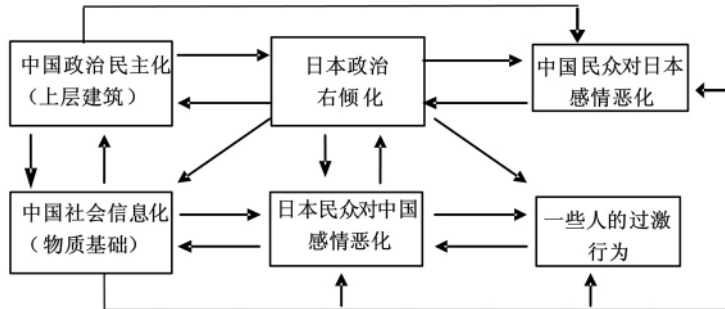
2. 中国信息化、民主化与中日民间感情。国际互联网和手机现已成为中国年轻人获取和交换信息的主要手段。中国民众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关心、参与意识明显提高,言论自由度明显扩大。日本领导人有关中日关系的错误言行以及中日关系方面的负面消息会迅速引起中国民众的反应。如下图所示,中日民间感情相互作用与影响的方式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社会信息化这一物质基础的变化必

^①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② 习近平2009年12月15日在东京的讲话, <http://news.0898.net/2009/12/15/511743.html>。

然带来公众言论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变化。问题在于,这一变化对中日关系来说,未必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在日本国内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右倾化抬头时,中国民众在互联网上任意的激烈抨击反而可能把问题和矛盾放大,从而加剧彼此情绪的对立。同样的现象在日本也会发生。例如,2010年9月在钓鱼岛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一些网民也开始攻击中国,从而使两国感情恶化。

图2 信息化、民主化与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民间感情的相互影响



中国社会信息化、民主化、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国民众对日感情产生影响的机理,可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恶化程度(Exacerbation) = (信息化(Internet) + 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 日本政治右倾化(Right wing of Japan)。这个公式所表达的意思是: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恶化的程度(E),基本上是由中国信息化(I)和民主化(D)相加的程度乘以日本政治右倾化(R)的影响和刺激作用所决定的。从上述逻辑关系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想减少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恶化程度(E)不是没有可能的,而最关键的是乘数——日本政治右倾化(R)能否得到抑制,从而给中日关系带来转机。

社会信息的传递与公众情绪的表达及相互影响,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2003年9月,中国外交部首次举行“公众开放日”。同年12月,时任外长的李肇星还在外交部网页和新华社网页与民众直接对话。从2009年起,温家宝总理连续3年在新华网与全国网友对话交流。他说“我每天晚上打开网,还是先打开新华网。因为新华网可以让一个真正想了解国家大事的人一目了然,看到许多重大新闻。”^①2008年6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人民网(bbs. people. com. cn)同网友们在线交流。他表示“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②

中国信息化、网络化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国际互联网造就的“民众话语权”和“民众信息发布权”的影响明显增大。2008年6月18日《中日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国网上民众强烈质疑。日方把春晓油气田说成“白桦”并说成是两国“共同开发”对象等,激起中国民众的坚决反对。中国政府不能不考虑国内民意,但也会避免受到极端主张的干扰。

四、当前中国民众与青年对日本的想法

自2004年起,《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每年一度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这些民调结果显示,在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执政期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亲近感上升;而在麻生太郎、菅直人执政期间,中国民众对日本亲近感下降。自2006年小泉纯一郎卸任后,由于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下降。但是,由于2010年9月发生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现实矛盾

① 新华网、中国日报网,2011-02-27,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shizheng/2011-02/27/content_12083618.htm。

② 人民网“强国论坛”,2008年6月20日,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093/125024/。

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改善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 2011 年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负面印象创历史新高

2011 年 6 月《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 NPO”在中日两国进行了第七次相关民意调查。^① 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普通公众对日本持正面印象的为 28.6%, 比上年调查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青年师生对日本持正面印象的为 43.1%, 下跌了 2.1 个百分点。对日持负面印象的普通公众达到 65.9%, 比上年增加 10 个百分点, 创调查以来最高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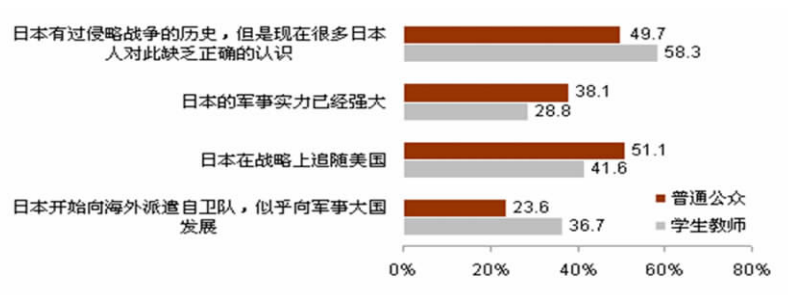
这次调查显示, 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原因首先是历史问题。不过, 回答因为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的人在普通公众中占 74.2%, 而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只占 46.3%。回答因为日本没有正确认识侵华历史的人在普通公众中占 71.2%, 而在学生和教师中占到 86.1%。另有 56.3% 的人选择了日本追随美国干涉台湾问题, 有 53.9% 的人选择了日本政府在对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这说明, 青年师生更加重视日本的现实态度。

(二) 中国民众认为对中国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美国第一、日本第二

关于中国面临的威胁, 如下表所示, 中国公众认为是美国的占 60.5%, 认为是日本的为 42.7%; 青年师生选择美国的占 78%, 选择日本的占 66.3%。如图 4 所示, 认为日本成为中国军事威胁的原因是, 51.1% 的普通公众认为日本在战略上追随美国导致了其成为中国的军事威胁, 49.7% 的人认为是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青年师生中认为日本有过侵略历史而现在许多日本人对此缺乏认识的比例最高, 达 58.3%, 其次是在战略上追随美国, 占 41.6%。另外, 中日钓鱼岛争端首次被认为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这次调查显示, 把两国关系发展障碍归咎于“领土问题”的普通公众占 58.4% 的, 青年师生占 42.8%; 如果加上海洋权益之争, 普通公众占到 84%, 学生占 79.3%。

普通公众	(单位: %)	学生/教师	(单位: %)
1. 美国	60.5	1. 美国	78
2. 日本	42.7	2. 日本	66.3
3. 俄罗斯	20.3	3. 印度	46.7
4. 欧盟	9.9	4. 俄罗斯	42.8
5. 朝鲜	7.9	5. 朝鲜	14.6
6. 印度	12.4	6. 韩国	12
7. 韩国	11.8	7. 欧盟	9.9
8. 中东	7.5	8. 中东	5.9
无	12.3	无	2.1
拒答/说不清	6.3	拒答/说不清	5.2

图 3 为何感觉日本是威胁?



注: 此题为多选题, 各选项之和比例大于 100%。

资料来源:《中国日报》、“日本言论 NPO”、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日关系舆论调查 2011 年研究报告》。

^① 这次中方调查的对象是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西安等 5 个城市的 1 540 名居民, 以及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 5 所重点高校的 1 000 名硕士生及青年教师。

(三) 关于中日加强战略合作的必要性与合作领域

中国普通公众赞成中日加强合作的超过40%，青年师生赞成加强中日两国间的战略合作的超过70%。普通公众认为应加强经贸合作的普通公众占52.6%，青年学生占37.8%，而对于“教育”与“文化”方面加强合作，学生教师的选择比例分别为13.5%和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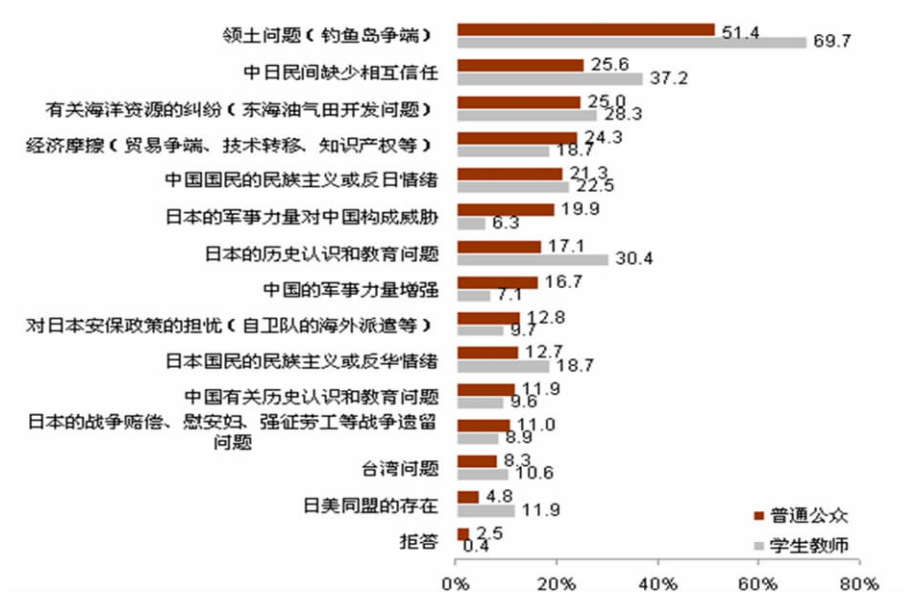
(四) 关于如何解决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

中国普通公众认为关键在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的占60.1%，“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的占54.6%，“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的占43.9%。而青年学生和教师认为关键在于“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的占81.4%，认为是“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的占55%，认为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的占58.1%。青年师生中近50%认为，增进两国民间交流对于改善两国关系“非常重要”，认为“比较重要”的占31.6%；而普通公众中有近60%的人认为“比较重要”，认为“非常重要”的约占20%。青年师生认为应加强中日“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媒体间的交流”的分别占49.3%和31.2%，均占前两位。普通公众认为应加强中日“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媒体间的交流”的分别占36%和33.9%。

(五) 钓鱼岛问题

《中国日报》和日本言论NPO所做的2012年度“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最主要的因素或最令人担忧的因素是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均占第一位，而且均高于上年调查。

图4 关于如何看当前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受访者中的普通公众51.4%持此看法；学生和教师则达69.7%。分别比日本的历史认识和教育问题高出1倍，这是过去所罕见的。这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日本民主党政府执政以来，在钓鱼岛争议问题上同中方的矛盾明显加深，并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民主党内阁成员没有参拜靖国神社，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大为下降。

据日本言论NPO同期调查显示，持同样看法的日本公众比中方所占比重更高。2012年调查结果高达69.8%，比上年的63.2%增加了6.6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坚持所谓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统一口径，导致在中日关系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日本外交却“不存在”。野田内阁和日本外务省或许没有意识到，钓鱼岛争议之所以今天会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最主要的因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们这种否认中日领土争议的事实造成的。对此，笔者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

冷经热”关系》一书中已经作出预测。如果日本政府继续无视中日两国的民意而继续顽固坚持既定立场,不仅将使中日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难以得到解决,甚至可能使事态继续恶化。不承认中日领土争议是一种很简单的外交辞令,但如今它正成为不负责、不正视现实、不尊重民意、不理解外交真谛的代名词。这说明,日本对华政策正在走入一个危险的死胡同,必须改弦更张,正视中日领土问题的存在,同中方展开外交磋商或谋求搁置争议,否则将没有出路。

五、结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这次调查表明,超过80%的中国普通公众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其中13.1%的人认为“非常重要”。学生教师认为两国关系“非常重要”的比例达到46.3%。认为未来10年中日关系对中国仍然重要的普通公众占60.1%,超过青年学生所占48.4%的比重。

中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但在人均GDP和经济质量方面仍落后于日本。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争议、民族感情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结构性矛盾。处理不好,美日有可能构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这是中美日三国都应努力避免的。

未来的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什么人有意挑拨中日关系,制造“中国威胁论”,事实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来说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国对日政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邓小平生前提出的“中日关系概括起来就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是我们的长期国策”。

然而,中国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还要看日方是否有同样的长期对华政策。目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和友好感情也在下降。日本对中国迅速发展壮大从心理上很不适应,特别是对中国国防力量的增强十分担忧。日本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和评论占主导地位。伴随信息网络的全面普及和政治右倾化,日本社会出现了针对中国的“愤青”和“网络右翼”。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企图通过不断刺激中国,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最终成为一把矛头可以转向中国政府的“双刃剑”。

就中国而言,对日本“情绪化”和“理想化”均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方也有需要引起注意和改进的问题。例如,中国人在日本刑事犯罪问题便严重有损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对此,中国政府需继续加强同日本警方的合作,并努力进行遵纪守法和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教育。更值得重视的是,伴随中国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众对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问题的关心及参与程度大为提高,这本身是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信息的多元化、多样化也容易给外部世界理解中国的政策造成判断上的困难乃至误解。应该承认,目前,中国人对日本了解得仍然有限,研究得尚不全面深入,但中国信息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则催生了对日言论的“自由化”。中国也出现了所谓“愤青”的“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就中国而言,对日言论“自由化”并不可怕,有不同观点也是很正常的,可怕的是由于缺乏对日本的真正了解而犯有违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观主义错误。

2012年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不久,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提出,中日关系要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应重点推进两大系统工程。“一是政治互信的系统工程。政治安全互信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看待对方,是对手、敌手还是合作伙伴?是挑战还是机遇?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前,两国缺乏互信的根源在于不能客观理性认识和对待对方的发展。中方反复重申,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对外扩张。这些绝不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为了取悦他国他人才这么讲,而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基本国情、发展现实和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二是国民感情的系统工程。中日友好在两国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世代友好下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近年来两国国民感情一直在低位徘徊。不久前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分别有超过六成的中国民众和近八成的日本民众对对方国家缺乏好感,降到了近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一现状令人担忧,也发人深省。其中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国政治安全互信不

足,有关敏感问题不时被炒作放大,双方民众对彼此的认识滞后于两国快速发展变化的现实等等。双方应高度重视两国国民感情出现下滑的状况,增强紧迫感,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大投入,多管齐下,争取尽快扭转这一局面。”^①

综上所述,在21世纪,中日两国互不为敌,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国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中日两国互为敌手,彼此制约对方的和平发展,则有损于两国共同的根本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将不断加深,如果中日两国尖锐对抗,对日本的盟国美国也十分不利,因而有头脑的战略家都会选择在争取中美日三国关系同时改善和发展的长远战略。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 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4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国文献出版社: 96.
- [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4] [日]朝日新闻, 1978-09-26.
- [5]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14.
- [6] 唐家璇. 劲雨煦风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3.
- [7] [日]葛西敬之, 安倍晋三对谈: 日中“政冷经热”论的虚实 [J]. Voice, 2005, (7); PHP 研究所. 安倍晋三对论集——纵论日本 [R]. 2006: 56, 57.
- [8] [日]信夫清太郎. 日本外交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40.
- [9]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86, 287.
- [10] [日]日本外务省. 杂件. 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 [M]. 1950: 575, 94.
- [11] [日]宫本雄二. 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M]. 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1: 96.
- [12] 何立波. 抗日战争期间鲜为人知的延安日本战俘学校 [EB/OL].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39/6957030.html>.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184.
- [14] 钟之成.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17.
- [15] [日]宫本雄二. 今后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M]. 东京: 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1: 96.

(责任编辑 许佳)

China's Policy towards Japan and Its Domestic Background

LIU Jiang - yong

Abstract: The year of 2012 i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 Japan relations. In comparison with Japan's chaotic politics and ever changing policies, there has been relative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in China's policy towards Japan. While there have been adjustments in the emphasis and specific contents of China's policy in different time and cases, these have primarily been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Japan, and also relate to China's ow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order to increase mutual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China's policy towards Japan and the domestic background behind it.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China's policy towards Japan; Sino - Japan relations; Diaoyu Island; Patriotism; Nationalism

^① 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唐家璇2011年10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